



社会学丛书

城镇化进程中 近郊村落的边缘化研究

以浙江9个近郊村落为例

卢福营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学丛书

城镇化进程中 近郊村落的边缘化研究

以浙江9个近郊村落为例

卢福营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化研究：以浙江9个近郊村落为例 / 卢福营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161-7159-2

I. ①城… II. ①卢… III. ①村落—城市化—研究—浙江省
IV. ①F299.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3371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304千字
定价 6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6)
第三节 调查村落与资料来源	(9)
第四节 核心概念说明	(21)

上篇 总体分析

第一章 近郊村落的城镇化	(29)
第一节 近郊村落城镇化的过程	(29)
第二节 近郊村落城镇化的水平	(37)
第三节 近郊村落城镇化的主要特点	(47)
第二章 空间格局：城乡因子的交错叠合	(55)
第一节 错杂化：地理区位与生活环境	(55)
第二节 碎片化：村域空间与居民聚落	(62)
第三节 混合化：社区格局与人居环境	(67)
第三章 社会结构：边缘要素的复杂组合	(73)
第一节 去农化：村落经济结构的变迁	(73)
第二节 非农化：村民职业结构的转换	(80)
第三节 异质开放：村落成员结构的重构	(84)
第四节 多元混合：村落组织体系的重组	(88)
第四章 治理体制：基层治理的双轨运行	(97)
第一节 基层管理的双轨化	(97)

第二节	基层服务的两重性	(108)
第三节	基层教育的两栖性	(117)
第五章	文化形态：城乡文化的互动共生	(121)
第一节	嵌入城镇因子的村落休闲文化	(121)
第二节	遭遇城镇化冲击的村落婚姻文化	(125)
第三节	兼容城乡的村落社会文化	(130)
第六章	城镇化中近郊村落边缘化的社会效应	(139)
第一节	引发近郊村落发展的“边缘效应”	(139)
第二节	冲击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146)
第三节	影响城乡社会一体化的进程	(152)
第七章	新型城镇化与近郊村落社会发展	(159)
第一节	中国式边缘化：面对近郊村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	(159)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正视近郊村落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	(161)
第三节	一体多元：培育近郊村落城镇化的总体格局	(167)
第四节	协同共促：建构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的良性机制	(170)
第五节	边缘创新：探寻近郊村落城镇化的新型方式	(173)
第六节	公平公正：转变近郊村落城镇化的发展政策	(176)

下篇 个案调查

第一章	边缘化与边缘效应：近郊村落城市化的境遇及路径	
——以浙江省台州市富强村为例		(185)
第一节	城市化进程中的富强村	(186)
第二节	边缘化：近郊村落城市化的现实境遇	(187)
第三节	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效应”	(190)
第四节	主动适应城市化进程：融合而非融入	(195)
第二章	近郊村集体农地的资产形式转换	
——以浙江省两个近郊村为例		(198)
第一节	个案概况	(198)
第二节	土地征用引发的近郊村农地资产多元转换	(199)
第三节	近郊村集体农地资产形式转换的重要趋向	(204)

第三章 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民的职业转换

——浙江省金华市陶朱路村调查 (208)

第一节 村民职业的非农化转换 (208)

第二节 村民职业转换博弈场的“局中人” (210)

第三节 村民职业转换的主要模式 (214)

第四节 建构多方参与、协同促进的职业转换机制 (217)

第四章 自主选择与政府规制：一个近郊村的城市化探索

——以台州市富强村为例 (221)

第一节 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的自主选择：理性选择
与非理性构造 (221)

第二节 政府规制：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与政府的博弈 (226)

第三节 妥善处理村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230)

第五章 边缘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郊村社区治理

——以浙江省陶朱路村社区为个案 (232)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变迁与治理方式转换 (232)

第二节 社区治理的边缘性 (233)

第三节 社区治理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242)

第六章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郊村“协同共治”模式研究

——以浙江省东阳市蒋桥头小区为例 (247)

第一节 个案村概况 (247)

第二节 “居政社治”的社区组织结构 (248)

第三节 “协同共治”的社区运行机制 (251)

第四节 城郊村社区“协同共治”模式的初步评估 (255)

第七章 城镇化中近郊居民婚姻模式的新变化

——基于杭州市头格社区的调查 (257)

第一节 城镇化中近郊居民婚姻模式的新变化 (257)

第二节 近郊居民婚姻模式变化的重要原因 (259)

第三节 近郊居民婚姻模式变迁的社会影响 (262)

第八章 城镇化中近郊村落流行的新型赘婚

——浙江省杭州市福村调查 (266)

第一节 福村概况 (266)

第二节	城镇化进程中短期剧增的新型赘婚	(267)
第三节	新型赘婚在福村短期剧增的原因	(273)
第四节	调查引发的思考与讨论	(277)
参考文献		(282)
后记		(290)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一 研究的社会背景

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各国城镇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同,所立足的基础和国情不同,因而势必选择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与方式。在一个农业分量很重、正在加速工业化的大国,如何推进城镇化是一个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全新事业。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经过反复的探索,中国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

纵观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以来的城镇化历史,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第一,城镇化正常发展阶段(1949—1957)。建立之初,面对国家既贫又弱的局面,首先升腾起的“中国梦”就是加速工业化,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动着城镇化的进程。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实施了 156 个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了城镇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一些项目所在地老城市的迅速扩张,而且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据统计,1949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10.6%;1957 年提高到 15.4%,年均增长 0.53 个百分点,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①。

第二,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1958—1960)。1958 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发动了一场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建设运动,史称“大跃进”。在这一时期,由于急于超英赶美,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

^① 陈甬军、景普秋、陈爱民:《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40 页。

的方针，号召全民大办工业，使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速发展。城镇人口年均增长 9.5%，新设城市 33 座。^① 城镇化率从 1957 年的 15.4% 猛增到 19.75%。^② 然而，在城镇化异常高速发展背后隐藏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第三，城镇化逆向发展阶段（1961—1976）。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出现了二次倒退，形成了独特的城镇化逆向发展现象。为纠正“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工业调整政策，并大力精减城市人口，充实农业第一线，由此形成了因纠正“大跃进”时期超速城镇化错误的城镇化逆向发展。同时，国家将建制镇标准由 2000 人调整到 3000 人。于是，从 1961 到 1965 年，城市数量从 208 座压缩到 171 座，城镇化率下降到 18%。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方面，因动乱造成了城镇经济发展的停滞；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致使大批城镇人口被转移到农村，形成了特殊的逆城镇化运动。城镇化水平进一步地从 18% 下降到了 1976 年的 17.4%。^③

第四，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1978—）。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走上了正常轨道，城镇化的步伐明显加速。与此同时，如何选择中国城镇化道路与路径，随之成为摆在面前的重大课题。有人主张大力发展大城市，有人坚持小城镇优先发展。经过不断摸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能只搞集中型的大城市化，也不能只实行分散型的小城镇化，只能选择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镇化。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既是对以往中国城镇化发展经验的总结，又为今后进一步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30 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在实践探索中实现着跨越，在与工业、农村发展的互动中获得了迅速发展。“据统计，2012 年

①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2 页。

② 陈甬军，景普秋，陈爱民：《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40 页。

③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2—173 页。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 52.57%。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7% 增长到了 52.57%。”^①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而且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从中国城镇化实践分析,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这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具体体现为三条路径:

其一,原有城镇扩张。在一定意义上说,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镇空间集聚的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的推动下,城镇经济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量,取得了迅速发展。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受利益的驱动,大量的生产要素流向中国城镇。如此,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原有城镇空间难以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需求,要求突破原有城镇空间的约束。因此,政府通过征用近郊村落土地、拆迁近郊村民房屋、转变近郊村民户籍、改变近郊村落管理体制等实现城镇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批近郊村落陆续被纳入城镇区域,城镇犹如“摊大饼”般地向郊区蔓延。这种城镇化路径表面看来似乎是城镇空间的扩张,在其背后实质是一种综合、复杂的社会变迁和城镇化过程。它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口的城镇化和城镇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其二,农村劳动力进城。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率先在农村地区推行以下放权力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赋予了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使他们获得了较大自由,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随着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从而导致了原来隐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显性化,大批农村劳动力需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②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乡流动政策和城乡关系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率加大。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务工经商,他们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城镇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空间。尽管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户籍身份尚未改变,但事实已经成为中国城镇社会中的特殊一族。他们不仅在统计学意义上为城镇人口增长和城镇化率

① 卢福营:《边缘化:近郊村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东岳论丛》2013 年第 6 期。

② 卢福营:《中国特色的非农化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天津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为城镇建设和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推动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农民的乡城流动,或者说农村劳动力进城无疑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其三,农村小城镇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立足本国国情,尊重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农村非农经济,推动了乡镇企业在农村异军突起,成为促进中国非农化的重要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村非农化主要表现为农村工业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式的分散的乡村工业化道路^①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污染严重、效益低下等弊病日渐显现,因此政府积极引导乡镇企业的集聚,大大推动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如此,分散的乡村工业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向适度集中的方向发展,使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同步发展。在乡镇企业崛起基础上形成的小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实现形式,这种依赖农村内生性发展而形成的农村小城镇,构成为一种极为独特的中国城镇发展模式。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路径,而且是中国城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城镇化的重要特色,它打破了仅仅依靠大工业改造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线性发展模式。或许,这就是中国之所以强调“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三条城镇化路径同时并存发展,共同推动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重要内涵。

然而,我们也应当理性地认识到,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实践中,不仅三条城镇化路径的运行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而且三条路径的协同性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从而制约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协调性,急切需要实现城镇化战略的调整。正是在此社会背景下,党和政府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新战略。

从中国城镇化历史发展看,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在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近郊村落边缘化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①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呈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事实表明,近郊村落的边缘化现象已经产生了不可忽略的正负两方面社会后果,这不仅已经对近郊村落的和谐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必然影响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影响城乡和谐与社会发展。那么,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处于什么地位?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为什么会出现独特的边缘化现象?近郊村落的边缘化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是一种理性选择还是一种非理性的构造?究竟是什么机制在发生作用?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当如何促进近郊村城镇化的有序化?如何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与发展?这些都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 研究的基础与局限

近年以来,针对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研究,已有众多类型不一的成果。诸如:李培林、蓝宇蕴等对广州“城中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南景村的研究,王春光、项飙、王汉生等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等等。这些成果对村落城镇化过程进行了生动又丰富的现象描述和理论分析,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素材和思想资料。但是,现有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理论空间:

第一,专以城镇化为背景或焦点研究村落变迁的成果不多。现有的村落变迁研究以经济发展为背景和视角的居多,忽略了城镇化这一最重大最基础的社会变革对于我国农村这一最基层载体的特殊影响。

第二,以近郊村为对象研究村落城镇化的成果不多。现有的村落城镇化研究以“城中村”为研究对象的居多,忽略了近郊村这一特殊类型的城镇化问题,造成村落城镇化过程研究的环节缺失。

第三,以近郊村落边缘化为主题研究村落城镇化的成果不多。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独特的近郊村落边缘化现象,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做出论证、解释和指导。但是,相关的研究成果极其罕见。

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化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现象,势必对近郊村落的和谐与发展乃至国家的城镇化和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目前的研究显然不能对其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指导。本书试图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化问题做较为深入的

实证研究。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 研究思路

城镇化是一个不可选择的一般规律,而城镇化道路和模式具有多样性、差异性。中国的城镇化既要借鉴城镇化的国际经验,又要树立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直面中国的城镇发展问题。^①从一定意义上说,近郊村落的边缘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是近郊村落由农村社会转向城镇社会的过渡阶段。在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城镇近郊地区呈现出城乡界限模糊、非城非乡的“半城镇化”状态并非中国所特有。但是,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边缘化现象具有特殊性。

根据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随着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势必推动城镇空间的扩张,从而促使近郊村落被陆续纳入城镇范围。近郊村落在由农村社会转向城镇社会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呈现出边缘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及其边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当代中国近郊村落的城镇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府主导和行政推动的“被城镇化”过程,正是这种“被城镇化”过程,导致了当前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和边缘化的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是影响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边缘化的一种特殊因素。

近年来,在近郊村落城镇化的实践中,各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公共政策行动。这些公共政策行动集中表现在土地征用开发、房屋拆迁安置、户籍改革(农改非)、撤村建居、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等。然而,由于缺乏中央政府统一的制度安排和具体明确的政策规范,各地政府主要根据自己对城镇化的理解,并结合本地具体实际,做出了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城镇化政策选择。加之,不同近郊村落的具体情况不同,地方城镇化政策在不同近郊村落的实施情况也有所差异,由此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近郊村落城镇化模式和边缘化现象。

基于以上事实,本书以省为考察区域,村落为分析单位,以空间格

^① 卢福营:《边缘化:近郊村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东岳论丛》2013年第6期。

局、社会结构、管理体制、文化形态为主要考察维度,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变迁过程,描述近郊村落边缘化的表现和特点,剖析近郊村边缘化的社会根源,分析近郊村落边缘化对中国城镇化以及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寻找促进近郊村落城镇化有序发展的对策,探究隐匿于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边缘化现象背后的理论意蕴。

二 研究方法

本书是一项区域研究,选择浙江省为区域样本,以浙江的社会经验为例,对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的边缘化问题进行个案研究。之所以如此,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单位,且具有相对完整的经济形态和区域文化特质,在城镇化发展中拥有相对自主性和独立的建制权,这些均会影响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过程,形成区域特色。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特色。不仅其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而且在城镇化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浙江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本书是一项实证研究。阿特斯拉德指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原始资料绝对不会自己解释自己。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也不存在这样的数据。数据需要解释。因为基于自身的经历,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真理,所以理论和方法论的任务不是创造真理,而是达到解释的真实。”^① 为了努力达到解释的真实,在研究中强调实际先于理论,事实先于价值,努力从实际情况中把握问题,分析得出结论。理论的建构基于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所有观点都以社会事实为客观依据。

研究中做了三个层面的调查:

第一,面上调查。即浙江省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变迁情况,特别是近郊村落边缘化现象的宏观调查。调查主要运用文献法和访谈法,重点调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各级政府出台的城镇化政策尤其是关于近郊村落社区的相关政策和做法,浙江各地城镇化的模式与近郊村落边缘化的类

^① [德] 阿特斯拉德:《经验性社会研究方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型,不同类型城市近郊村落边缘化的具体表现与特点,近郊村落边缘化引发的突出问题,各级政府应对近郊村落边缘化问题的实践等。这种面上调查,一方面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全省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边缘化现象的总体情况和区域特征;另一方面有助于透析近郊村落边缘化的特定社会文化基础。

第二,典型调查。这种调查实质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他在《寻乌调查》中指出:“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①我们借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时常用的分类选点的典型抽样做法,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下选择了9个典型的近郊村落作为样本进行典型调查。其中,省城杭州市近郊村或社区3个、地级市城镇近郊村或社区3个、县级城镇近郊村落或社区3个。典型调查主要运用田野调查方法,通过文献收集、实地观察、面对面的个别访谈、集体座谈等多种方式获取一手资料。重点对城镇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过程、当下近郊村落边缘化的具体表征和特点、近郊村落边缘化引发的焦点问题、近郊村落边缘化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对村落乃至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影响、导致近郊村落边缘化现象的相关因素和社会根源、不同层次和界别的民众对近郊村落边缘化现象的看法等做深入细致的微观考察。典型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丰富、生动、具体、深入的资料,以期建立一个真实可靠的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边缘化的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景象。所以,这种研究方法首先要求对所研究的社会事实进行如实的描述。然而,如实的描述并非易事:(1)如实描述需要足够的理论准备,否则搜集的材料杂乱无章、真假难辨;(2)如实描述有时会触动某些人和某些部门的利益,遭到种种阻挠,有一定的风险;(3)如实描述有可能对现有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挑战,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和政治勇气。^②

总之,在方法上,本书努力跨越那种以一个村庄为案例的个案研究,而以处在同一城镇化生态中的数个近郊村落为研究个案,以拓展研究的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② 参阅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域。同时,努力将典型调查的深度与面上调查的广度相结合,实现彼此之间的互相补充。

第三节 调查村落与资料来源

一 调查的村落

村落是本项研究的具体实施对象。我们通过立意抽样的方法选择了有代表性的9个近郊村落作为实地调查的对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调查对象的选择标准。根据相关研究和自己以往的调查,确定了选择本项调查村落的参考标准:一是地理位置上处于城镇周边,紧邻城镇建成区;二是选择调查村落时要求在地域布局、城镇层级上具有代表性。

第二步:选择调查的候选村落。根据立意要求,即选择调查村落的标准,联系当地政府部门选择了一批符合标准的近郊村落。然后,课题组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候选村落逐个进行初步的实地走访,亲身体验和考察村落的基本情况。

第三步:确定调查的典型村落。根据地方政府部门提供的介绍和部分资料,以及初步走访的印象,经与当地政府部门相关领导协商,最后确定了9个典型调查的对象。省级城镇近郊村落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头格社区、江干区的大塘社区、西湖区的良户社区;地级城镇近郊村落为金华市的陶朱路村、绍兴市的外山头村、台州市的富强村;县级城镇近郊村落为东阳市蒋桥头村(小区)、诸暨市的城西村、武义县的大坤头村。9个典型调查村落的基本情况如下:

头格社区位于浙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①的西南面,距离下沙街道办事处以东约2公里处。东南与浙江省武警副食品基地、七格社区仅一河(月雅河)之隔,南临钱塘江,西面与九堡镇杨公村、八堡村、九堡村相邻,北面是乔司镇胜嫁村;艮山东路横穿头格社区。社区居委会驻社区中

^①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区,是全国唯一集工业园区、高教园区、出口加工区于一体的国家级开发区,总面积144.7平方公里(其中下沙区块104.7平方公里、江东区块40平方公里),委托管理下沙和白杨两个街道共24个社区,辖区人口约42万。

心路以北、月雅桥西面。头格社区是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大的社区，面积约2平方公里，有886户，2768人，共分9个村民小组。

新中国成立前，头格社区所属地段为钱塘江沙滩，因开荒而人气逐步聚集，地属杭州第六区禾丰乡二十一堡。1949年4月，设禾丰乡头格村。1950年5月建余杭县盐区，头格从禾丰乡分出，改为四格乡头格村。1958年，在人民公社制下改为九堡人民公社四格管理区一连；1962年划为下沙人民公社头格大队，下设21个生产队，后来生产队时有调整。1983年，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并建立村委会，下设9个村民小组，为杭州市余杭县下沙乡头格村。1993年成立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后，头格村于1996年划归杭州市江干区。1998年，改为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镇头格村。2005年12月撤村建居，改为杭州市江干区下沙街道头格社区。

头格社区的征地和城镇化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当初主要用于道路、污水处理厂等公共设施建设。2000年后特别是2008年5月以来，大量土地被征用，开发区付给社区50%的土地征用补偿款，预征了头格社区的大部分集体土地。目前，社区仅剩100多亩土地。

随着土地被征用，村民户籍的“农转非”工作逐步推进，村落居民的户籍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村落居民原以农业户籍的农民为主，伴随着村落城镇化的推进，调查时已转变为农业户与非农户并存、农民与市民共居的成员结构。头格社区现有人口2768人，其中，农业户籍人数1089人，城镇户籍人数265人，“农转非”人数1414人。在“农转非”成员中，超过劳动年龄段（即男60周岁以上，女50周岁以上）的为634人，劳动年龄段内（即男45—60周岁，女35—50周岁）的为780人。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头格社区分两批进行村民住房的整体拆迁，2010年拆迁全部完成。由于村民拆迁安置房尚在建设之中，社区所有村民被政府统一安排居住在过渡房内。为保证村民能够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收益，头格社区在集体留用地上建设“外来人口公寓”，并按每户160平方米量化到家。“外来人口公寓”的资产实行股份合作制，由社区统一经营，集体招租，年底分红。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头格居民逐渐享受了一些非农性质的社会政策。比如：按当地政府的政策规定，头格社区多数居民通过个人购买、社区补